

從創傷到復原： 陪伴前臺籍慰安婦二十年的啟發

文 | 康淑華 | 臺灣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

暴力倖存者的復原是一條漫長的路，實務及研究證明，復原有賴多元保護因子的互相支撐，包括自我能量的提昇、家庭的支持，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等。而這三項保護因子的建構，卻往往相當不易，其困境包括來自於專業人員的不足，或因案量過大導致服務期程過短及不夠深入，家庭受傳統社會氛圍影響而對於暴力倖存者的不諒解，以及整體社會環境指責暴力倖存者的不友善態度等，都是阻礙暴力倖存者是否得以從創傷中復原的重要因素；而這或許也是為何在臺灣極少有暴力倖存者能從被服務者轉而為倡導者，為自己及其他倖存者發聲的原因之一。在這當中，有一群婦女卻打破了這樣的框架，勇於站到幕前爭取自己的尊嚴及正義，那即是前臺籍慰安婦阿嬤。這條漫長的正義之路已走了二十年，雖然要求日本官方的道歉及賠償始終未有結果，但阿嬤在此歷程中所展現

的能量，卻對於反性別暴力運動帶來許多啟發。

1991年，韓國婦女金學順出面控訴日軍二次大戰的性奴隸制度，震驚了社會大眾；1992年2月，日本眾議院前議員伊東秀子女士在日本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發現三通電報，分別是昭和17年（1942年）日本的臺灣軍司令官應其南方總軍之要求，徵召50名「慰安土人」到婆羅州沙勞越服務，請求日本陸軍部核發渡航証，證實二次大戰期間，確有臺灣婦女被送到日本前線軍隊做慰安婦。為此，婦女救援基金會隨即在同年成立申訴專線，進行前臺籍慰安婦訪查工作。經過調查認證，確定有58位婦女當年被迫成為日軍慰安婦，但據學者推估，臺灣的受害婦女至少有兩千人。本會當年推動政府組成跨部會「臺灣慰安婦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委託本會



辦理前臺籍慰安婦的基本生活照顧與個案服務，並支持本會出席相關國際會議，為前臺籍慰安婦爭取正義和賠償。1999年，本會陪同9位前臺籍慰安婦親自前往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遞狀，提出『臺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損害賠償』訴訟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受害人道歉及賠償。2002年10月一審敗訴，2004年2月二審敗訴，2005年2月東京最高法院宣判敗訴定讞，而亞洲各受害國家的對日訴訟案亦都遭敗訴。儘管面對此訴訟結果，受害國家的支持團體並不放棄，透過連帶會議及國際串連，並結合日本民間及部分國會議員的力量，目前仍持續促使日本政府通過「戰時強制被害者問題解決促進法案」，還給受害人一個公道。

這個漫長的歷程，一走已是二十年，當年已屆六七十歲的阿嬤們，如何面對慰

安婦事件所帶來的創傷？這二十年來，我們如何陪伴著阿嬤走向復原的歷程？而阿嬤又如何從一位暴力倖存者轉而成為運動的倡導者？簡單地從上述三個復原因子來看，也許我們可以一探脈絡：

一、自我的增權

1992年本會第一次辦理記者會向臺灣社會揭露此事時，阿嬤躲在黑色布幕之後面對記者，代表的是這件事背後的家庭及社會壓力，以及倖存者如何吞下了這些壓力及看待自己。這二十年來，本會及許多關心阿嬤的人扮演著一個重要的支持者角色，讓許多阿嬤得以逐漸坦然面對慰安婦這段歷史創傷。從1996年開始，我們開始不間斷地辦理身心治療工作坊，包括創傷治療、談話治療、藝術治療、瑜伽治療、戲劇治療，到晚期的攝影治療及情緒

支持等，迄今已逾十六年。雖然不敢斷言說創傷已完全復原，但我們至少提供了阿嬤一個友愛及支持的環境，讓阿嬤可以在此獲得支持，並從中得以獲得力量去面對過去的傷痛。而近五年來，隨著阿嬤已步入八九十歲的高齡，參與團體的人數凋零減少，我們的陪伴方向也跟著逐步調整，因為阿嬤同時面對的是身體的病痛，以及姊妹們的一一離開。我們在工作坊中討論死亡——這個禁忌卻是必然的議題，也陪伴阿嬤檢視生命歷程的收穫與美好，以及欣賞自己的勇氣與力量。還記得已去世的滿妹阿嬤曾經對我如此分享：

「許醫師（談話治療的帶領者）說我們是人間的菩薩，因為我們去做慰安婦，救了其他可能會被抓去的女孩子…」這個解釋，讓阿嬤釋懷。



臺灣婦女救援基金會召開記者會，協同傷心又勇敢的阿嬤們公開抗議《臺灣論》作者小林善紀和許文龍於書中表示「慰安婦均為自願」等荒謬說法（攝於 2001/2/27）。

另一位原先不願意公開的八十九歲陳樺阿嬤曾經告訴過我：「我過去一直擔心我的那些朋友若知道我的過去，不知會如何看我，但這幾年看到你們對我的關心及努力，我覺得，我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讓年輕人知道，教育我們的下一代…」阿嬤開始願意在一些場合分享她的故事。



2003年，臺灣阿嬤赴首爾參與「週三抗議」運動。1992年由韓國人權團體「挺身隊對策協議」首度發起，號召聲援者與曾為慰安婦的阿嬤每週三中午，於首爾「日本駐韓大使館」前靜坐抗議。

當然，常常接到的是來自阿嬤的電話：「什麼時候還要辦活動阿？」我們知道，阿嬤喜歡我們的陪伴，這份二十年的友誼，對我們彼此的生命都有特別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阿嬤在這歷程，停止責備自己，並進而肯定及接納自己。

二、家人的支持

對於阿嬤們而言，家人的態度決定了她們是否可以坦然面對這件事。小桃阿嬤常說，她永遠忘不了當年她從南洋回來後，家人拒絕她，並說：「我們陳家沒有這樣臭賤女人！」徹底傷害她的自尊。有些阿嬤從來沒有與家人討論過這件事，但其實是家中一件公開的秘密；也有些家



圖為鄭陳桃阿嬤（暱稱為小桃阿嬤）下廚做出自己兒時最愛的菜餚——炒米粉，回憶小時候阿嬤炒給她吃的口味；這是攝影工作坊其中一個活動，當小桃阿嬤炒菜時，其他阿嬤在旁拍照、練習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使用數位相機。



在陪伴阿嬤從創傷中復原的過程中，鼓勵創作是其中一個方式。圖為陳鴛阿嬤在攝影工作坊的作品；阿嬤的女兒小時候嚴重發燒時，阿嬤照著鄰居的建議讓她睡在香蕉葉上，果然退燒痊癒，所以便以香蕉為創作主題。

人支持及陪伴阿嬤面對這件事，陪伴阿嬤的對日訴訟及參與我們的活動。這幾年來，我們在辦理工作坊及阿嬤的旅遊活動時，都會盡可能鼓勵阿嬤邀請她的家人一起參與，這樣的參與，讓家屬更加瞭解及認識阿嬤與慰安婦這件事的關係；而這樣的支持，也讓阿嬤更加放心與自在地參與慰安婦對日求償運動。

三. 社會的參與

對這群阿嬤而言，別有意義的一件事，是因為在晚年參與了慰安婦對日求償運動，而所展開的社會參與及所獲得的社會支持。阿嬤與我們一起出席國際會議，一起到日本的高中及大專校園對年輕學子講述生命經歷，並在國內參與許多的抗議行動。這個過程帶給阿嬤的感受及鼓勵，對於阿嬤從創傷中走出，有著一定的比重。大桃阿嬤參與國際會議，受到韓國阿嬤的鼓舞，決定站出來，以真實面目面對世人：「錯的是日本政府，不是我們，為何我們要覺得丟臉？」鼓勵了更多的臺灣阿嬤可以走出，勇敢控訴。另一位最高齡的秀妹阿嬤，也因為社會參與，從原本的不敢發言，到能夠在校園宣導中侃侃而談。阿嬤常說：「謝謝你們的陪伴，我們

才能出國。」但其實是我們透過阿嬤，更加瞭解生命的力量與可能性。

從婦援會與慰安婦阿嬤的二十年友誼，我們得到了許多價值與啟示，第一：暴力倖存者的復原需要時間，這個歷程，不僅靠倖存者的個人努力，還有賴家庭及社會的長期支持，才能讓這條復原之路不再漫長。第二：當暴力倖存者得到足夠的支持，不論是來自自我還是外界，她們可以展現出充沛的能量及無比的潛力，成為生命的勇者，為自己發聲。第三：透過慰安婦阿嬤的故事，我們期待可以去反思目前整體社會對於性別暴力倖存者的陪伴及支持是否足夠？資源的放置是否正確？目前的國家政策及服務是否足以去支持更多的倖存者為自己發聲？如果我們期待下一代可以擁有一個不再有暴力的未來，這些政策的檢視就顯得更加急迫。此外，我們實應促使性別暴力的政策規劃及發聲不再只是專業人士的權利，更應加入倖存者的聲音，唯有如此，這樣的運動主體才是回歸到倖存者本身，透過她們的聲音，瞭解她們的需要，而我們是站在陪伴者及催化者的位置，打破專業權控，回歸到反性別暴力的初衷。